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94-104.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07dthmc>



从流散创伤到大屠杀隐喻：古尔纳小说的共同体叙事

张 旻 (Zhang Yang)

摘要：大屠杀在古尔纳的小说中并非历史事实的单纯再现，而是具有隐喻意义，表征人类构建共同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本文以 J.希利斯·米勒的“共同体焚毁”说、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说以及法农的“殖民暴力”论为理论资源，选取古尔纳《天堂》、《来世》、《海边》三部代表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跨越前殖民、殖民、后殖民三个历史时代，参照纳粹主义对犹太人共同体的系统性摧残，挖掘德国殖民主义、非洲本土激进民族主义对东非社会共同体的瓦解逻辑，试图揭示：古尔纳将东非海岸难民和移民充满苦难的流散生涯与大屠杀创伤进行隐喻性的跨时空类比，呼吁国际社会对前者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与同情。与此同时，本文也试图指出，作家并未纠结于历史悲观情结，而是在小说中多次表达了形塑共同体的希望与可能性，凸显小人物之间的温情纽带、家族记忆传承与历史恩怨和解，以此来做出对大屠杀隐喻的批判性回应，寄予了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世界主义理想。

关键词：古尔纳；流散；大屠杀；隐喻；共同体

作者介绍：张旻，讲师，北京语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英语小说、西方批评理论，电子邮箱：benfrank@live.cn。

Title: From Diasporic Trauma to Holocaust Metaphor: The Community Narrative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s

Abstract: The Holocaust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s is not a mere representation of theory of colonial violence as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the paper takes Abdulrazak Gurnah's three representative novels, including *Paradise*, *By the Sea*, and *Afterlives* as its research texts. It spans

the pre-colonial,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cal period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ystematic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by Nazism. Exploring the logic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East African social comm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German colonialism and radical African nationalism, the paper reveals that by drawing a metaphorical, trans-temporal and trans-spatial parallel between the suffering diasporic lives of the refugees and migrants from the East African coast and the trauma of the Holocaust, Gurnah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give equal attention and sympathy to the former. Meanwhile, the paper also attempts to show that instead of being trapped in historical pessimism, the writer repeatedly demonstrates his hop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highlighting the emotional bonds,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memory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historical grievances among ordinary individuals, which offers 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 metaphor, conveying his humanitarian spirit and cosmopolitan ideals.

Keywords: Abdulrazak Gurnah; Diaspora; Holocaust; metaphor; community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Lecture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ing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E-mail: benfrank@live.cn

一、引言

纳粹大屠杀在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的小说中着墨不多, 可谓零星稀疏。古尔纳以描绘东非海岸难民、移民的流散生涯著称于世, 为何在创作中会偶尔提及大屠杀这一看似并无关联的历史事件? 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背景化的点缀, 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刻的寓意? 有关这一问题, 国内外学界尚缺少充分的探讨。多数评论者着眼于古尔纳笔下有关英国殖民历史、后殖民时代非洲本土激进民族主义的描写, 对于德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作家笔下的再现缺乏关注。国内学者指出, 古尔纳的作品“聚焦于欧洲殖民史中长期被忽视的德国在东非的殖民问题。” (郭丹阳、王卓, 2022, p. 21) 总体而言,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方面尚有待开拓。本文借助 J.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 有关大屠杀对共同体进行系统性破坏的论述, 结合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与弗朗兹·法农 (Frantz Fanon) 对殖民暴力的批判, 分析古尔纳涉及德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历史的《天堂》 (Paradise, 1994)、《海边》 (By the Sea, 2001) 和《来世》 (Afterlives, 2020) 三部作品, 以前殖民时代 1、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为三个历史阶段, 探讨作家笔下大屠杀隐喻书写与共同体叙事的隐喻性联系, 指出大屠杀作为历史事件, 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更多传达了一种象征意义, 表征人类构建共同体的普遍困境; 与此同时, 作家也似乎通过将犹太人遭受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与东非海岸难民、移民坎坷艰险的流散生涯并置参照, 呼吁世人对后者给予更多关注与同情, 表达了形塑命运共同体的永恒希望。

二、大屠杀与共同体叙事的内在联系

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2011）中指出：

“焚毁”一词最具冲击性，它表明共同体不仅崩解得七零八落，而且还被焚毁，消耗殆尽。……纳粹驱逐数百万犹太人，让他们流离失所，破坏犹太聚居区的家庭和社群纽带。……（米勒, 2019, p. 8）

纳粹大屠杀破坏的是犹太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区群体，使原本团结互助的犹太人群体被彻底打散，沦为一个又一个易为控制、迫害乃至屠戮的脆弱个体。换言之，大屠杀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乃至毁灭。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中认为，纳粹大屠杀是欧洲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广大第三世界推行的暴政向欧洲本土的回流与反噬。她将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时代视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的前奏阶段。”（阿伦特, 2014, p. 183）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3）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非洲黑人在数个世纪以来遭受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与纳粹屠犹形成隐喻性参照。他指出，“纳粹主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真正的殖民地。”（法农, 2005, pp. 55-56）然而，在欧洲清算纳粹历史债务之时，第三世界却仍然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处境：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把它们旗帜和警力从我们的领土上撤走时并未还清欠我们的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者在不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如同真正的战犯。资本主义……使用的主要手段是流放、屠杀、劳役、奴役。（法农, 2005, p. 55）

沿着上述思想家的理论脉络，不难看出，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残酷而持久的殖民统治所摧残的正是当地人的共同体，在共同体瓦解的创伤结构上存在隐喻意义上的相似性。古尔纳正是以文学的话语呼应了上述思想家的观点。他指出：“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史是一段恐怖的历史。”（Gurnah, 2005, p. 42）大屠杀作为历史事件，并非作家刻意描写或再现的现实目标，而是更多表现为一种象征或隐喻，暗示东非海岸难民、移民的苦难命运与纳粹时代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存在隐喻性呼应关系，却没有如后者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同情，甚至面临被历史遗忘的风险。

在古尔纳的笔下，大屠杀隐喻书写往往与共同体的毁灭相互联系，揭示共同体构建的重重困境。比如，《天堂》^①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大屠杀，却借助小说人物的间接转述呈现出德国殖民者在征服当地人、摧毁原住民社会时表现出来的冷酷与残暴。例如，优素福（Yusuf）听孩子们描述德国人的行为，得知德国人会将干活不卖力的人吊死或者砍头；阿齐兹叔叔（Uncle Aziz）讲述了德国殖民者如

^①注释：《天堂》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小说再现的是一个欧洲殖民者尚未完全染指的东非商贸世界图景，有关欧洲殖民者的描写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因此姑且称呼小说描述的这一时期为前殖民时代。

何摧毁当地阿拉伯人的社会：“‘……在埃米尔·帕夏之后来了德国指挥官普林齐，他立即发动战争，杀死了苏丹和他的孩子，以及所能找到的他的所有部下。他先是把阿拉伯人踩在脚底下，然后把他们赶走。’”（古尔纳, 2022, p. 148）另外，延续优素福故事的《来世》则直接在结尾处提到了伊利亚斯（Ilyas）死于纳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的悲惨往事，他原本是来自东非海岸的黑人，因为和德国女子的风流韵事而触犯纳粹当局的种族主义法律，最终沦为纳粹大屠杀的牺牲品，其试图融入德国社会的一厢情愿彻底化为泡影。最后，《海边》描写了1960年代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彼时欧洲殖民势力已经逐步退出，阿拉伯人和黑人势力先后执掌政权。然而，新政府却并没有带来公平和正义，政治腐败、族裔矛盾、阶级压迫等社会问题根深蒂固，当地人民仍旧无法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构建和谐、友爱、平等的共同体希望渺茫。小说主人公之一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身逢动荡时局，遭人诬陷，锒铛入狱，受尽屈辱与折磨。他提起自己曾经看到的一张记录纳粹时代的老照片：

……有三个犹太男子跪在地上，一个人穿着深色的西装，打着领带，另外两个人穿着长袖衬衫，其中一个人卷起了袖子。他们拿着刷子在擦洗维也纳的人行道。人行道上，在他们的四周，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站着许多维也纳人，他们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那三个犹太人干脏活。那些人年龄各异，有妈妈和爸爸，有爷爷和小孩，有些人依靠着自行车，有些人拿着购物袋，笑容可掬，样子都像是很文明、体面的人，而他们面前的那三个人则低三下四。照片里看不到卐字，只有普通人在嘲笑三个犹太人。真主才知道那三个人遭遇了什么情况。（古尔纳, 2022, p. 267-268）

照片中犹太人卑躬屈膝、挣扎求生的场景令奥马尔不禁心生同病相怜之情，将自己的处境与惨遭纳粹种族主义迫害的犹太人进行隐喻性的联结，暗示了大屠杀浩劫留给历史的震撼余波。另一位主人公拉蒂夫·马哈茂德（Latif Mahmud）在留学东德期间，聆听东德笔友母亲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领教了这家白人刻在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观念，以间接的形式体验了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古尔纳小说中的大屠杀隐喻书写在控诉德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之余，也揭露了非洲本土激进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具有超越性的象征意义，表征人类构建共同体的普遍困境。接下来，本文将深入分析古尔纳小说中构建共同体困境的诸多具体表现。

三、构建共同体的困境

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人物往往面临孤苦伶仃、漂泊无依的夹缝处境，鲜见相濡以沫、守望相助的温情，缺少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言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中“真正的、有机的生活”（Tönnies, 2001, p. 17），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纯粹机械的聚合”（Tönnies, 2001, p. 17），与滕尼斯有关“社会”（*Gesellschaft*）的描述更为接近。作家借助大屠杀这一极端历史案例来象征小说人物构建或追寻共同体的困境。以《天堂》《海边》和《来世》为例，

人物不论是面对东非社会内部的不同族裔或阶层，还是身处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殖民体系，抑或来到欧洲宗主国本身，都遭遇到不同程度上共同体缺失的症候。

首先，在《天堂》中，主人公优素福面临双重困境：阿齐兹叔叔的商贸帝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园，而德国殖民军队事实上也并非理想的投靠选择。一方面，有关阿齐兹叔叔商贸帝国的描述揭露了东非早在欧洲殖民之前就已经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古尔纳认为，在欧洲殖民主义全面渗透之时，东非海岸社会早已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所有种类的残忍存在于其内部，已非其自身所能解释清楚。对妇女心狠，对儿童冷酷，对你眼中的弱者残酷，正如所有社会所做的那样。”

（Gurnah, 2004, p. 360）比如，优素福与阿齐兹叔叔并非亲戚，其父因欠债而不得不将他抵押给后者做奴仆或劳工，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多为上级与下级、主人与奴隶、雇主与雇工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他流露出独立思考的倾向时，就会遭到阿齐兹叔叔手下的呵斥与责打：“他无法让自己称阿齐兹叔叔为老爷，尽管每次称叔叔时都会挨哈利勒的狠揍。”（古尔纳, 2022, p. 36）优素福爱慕的女子阿明娜（Amina）最终被阿齐兹叔叔霸占为妻子，她扔掉了祈求好运的护身符，放弃了追寻独立与幸福的幻想，承认自己生活在绝望之中：“‘……如果有人间地狱，那就是这里。’”（古尔纳, 2022, p. 255）在阿齐兹及其手下眼里，非洲土著部落与野蛮人并无区别，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剥削、欺凌掠夺，其压迫逻辑与暴力行径与欧洲殖民者具有可参照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古尔纳在《天堂》中也以零星的片段塑造了德国军队作为侵略者的狰狞形象，预示了殖民主义即将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历史创伤，正如他在2021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所言：“……我们的腐败和滥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古尔纳, 2022, p. 14-15）古尔纳不吝细节地描述了优素福眼中一名德国军官的外貌：“……他的笑容是一种僵硬的畸形怪相。……那是一具死尸的面孔，优素福对它的丑陋和残忍的样子感到愕然。”（古尔纳, 2022, p. 273）由此可见，优素福投奔德国殖民者，并非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而是迫于走投无路的无奈选择。

其次，《来世》延续并且丰富了《天堂》的故事脉络，以多重叙事视角主要展现了伊利亚斯与哈姆扎（Hamza）等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东非海岸或殖民宗主国德国的跌宕人生，同样呈现出一幕幕共同体支离破碎的残酷画面。首先，小说中共同体的构建困境集中体现于两位主人公与德国的复杂关系。主人公之一伊利亚斯由德国农场主收养长大，对于德国的所谓“文明使命”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推崇德国的语言、教育、医学、军事等文明成果，参加德国的非洲雇佣军“阿斯卡利”（askari），心甘情愿为殖民者充当帮凶与炮灰，在外表打扮、言行举止等各个方面刻意模仿德国人，渴望完成殖民身份的重塑，从而融为德国的一部分。然而，他在艳羡于德国先进文明之余，却忽视了沦为被殖民者的屈辱与苦难。古尔纳通过转换叙事视角，从小说另一个人物哈利法（Khalifa）的视角来揭露出伊利亚斯叙事的不可靠性。透过哈利法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比较真实客观的情况。一方面，德国殖民者以残酷手段镇压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uprising）：

在起义的地区，驻防军把所有人都当成起义军士兵对待。他们烧毁村庄，践踏农田，劫掠粮食。在充满白色恐怖的焦土上，路边绞刑架上到处挂着非洲人的尸体。（古尔纳, 2022, p. 19）

另一方面，当伊利亚斯在咖啡馆与众人争论、为即将与英国开战的德国殖民者辩护之时，哈利法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不义性质，不管何方获胜，受害者都是非洲人民：

.....哈利法说道：“这是两伙残暴和邪恶的侵略者之间的战争，一伙在我们这儿，一伙在北方。他们打仗是为了争夺谁该把我们全吞掉.....”（古尔纳, 2022, p. 53）

虽然伊利亚斯对德国保持高度的忠诚与认同感，却自始至终没有能够真正得到宗主国的认可与接纳，不断遭受种族主义的排斥与歧视，多年来游走在德国社会边缘：在战争结束后，他辗转移居德国，先后在德国船上做雇工、在社会底层的夜总会当歌舞演员；在与德国女子结婚后，却被法院勒令搬出租住的房子；因为“阿斯卡利”雇佣军身份并不受德国政府认可，申请抚恤与战功勋章而不得；尽管参加了纳粹旨在恢复德国昔日殖民地的“帝国殖民联盟”（Reichskolonialbund），为纳粹的主张摇旗呐喊，却因为“违反纳粹种族法、玷污了一个雅利安女子而被捕。”（古尔纳, 2022, p. 334）最终殒命于纳粹集中营，在宗主国追寻共同体的美梦就此破灭。与伊利亚斯相似，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哈姆扎也参加了“阿斯卡利”雇佣军，遭受德国殖民者的压榨、歧视与欺辱，同样陷入共同体缺席的困境。在接受严苛的军事训练时，哈姆扎和他的战友们被德国人视为地位低贱的野蛮人、智力低下的猪狗，动辄遭受暴力与辱骂，经常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当有倾向的德国长官要求哈姆扎充当在他身边服务的勤务兵时，后者在深感羞耻之余，又为自己可能被战友排挤出集体而感到担忧：“.....他曾觉得自己已经与大家融为一体，与大家一同吃苦，一同受罚，以前从没有人这么轻蔑地跟他说过话。看样子他们这是要把他给轰出去了。”（古尔纳, 2022, p. 80）虽然德国长官对哈姆扎怀有暧昧的，教授他德语，使他免于鞭打与劳役，甚至在他身负重伤之后施以援手、加以救治，并且赠给他席勒的著作，但是仍然难以掩盖这种扭曲关系背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长官对于哈姆扎除了横加蔑视、辱骂与体罚之外，还指出了哈姆扎既失去本土文化之根、又无法被宗主国真正承认的尴尬处境：“‘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古尔纳, 2022, p. 104）在德国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之下，哈姆扎以及与他遭遇相似的非洲人实际上沦为故土的流亡者，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这一命运在哈姆扎于战后重返儿时故乡却发现自己难以寻觅栖身之处便可略见一斑。其次，在小说中，古尔纳也通过描写伊利亚斯之妹、哈姆扎之妻阿菲娅（Afia）早年的悲苦命运来指涉东非海岸本土社会的错综复杂，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尽管并没有欧洲殖民者的直接介入，却同样暴露出共同体构建的诸多困境。阿菲娅自幼父母双亡，不得不投靠养父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常遭受养父母及其子女的役使、辱骂、殴打与羞辱。当伊利亚斯前来接走妹妹时，才发现她悲惨的处境：“.....她穿着一身破衣烂衫，就像他们家的奴隶一样。”（古尔纳, 2022, p. 43）哥哥短暂的到来给她带来些许关爱、尊严与启蒙。尽管如此，伊利亚斯却执意参加德军，不得已把妹妹送回养父母家中，使她再次身陷苦海。养母依旧将她视为家中的奴仆；当养父发现阿菲娅能够在石板上练习写字，竟然把她殴打至左手骨折、满身伤痕；养父母的女儿对她冷嘲热讽，他们的儿子甚至对她动手动脚。阿菲娅的不幸遭遇折射了东非海岸社会内部难以协调的复杂关系，从这一人物

形象身上可以看出，古尔纳在批判欧洲殖民主义之外，也对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话语持有怀疑态度。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或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创作并不能有效反映非洲本土社会的真实情况：“……在诸多情况下，不稳定的社会想要彼此和睦相处，就必须进行协商，但是他们的作品明显简化了协商的复杂与难度。再没有比我长大的东非海岸更复杂的地方了。”（Gurnah, 2004, p. 360）古尔纳或许正是借助《来世》来暗示，协调复杂微妙的本土社会关系的困难，也许并不亚于化解殖民主义的遗毒，构建共同体之路注定充满艰难险阻。

最后，《海边》分别从两个主人公奥马尔与拉蒂夫的视角以交错的方式展开叙事，两人因为命运的阴错阳差而结为仇家，同时却也经历了相似的流散生涯，同样难寻寄托身心的家园，其生存处境均体现出共同体缺失造成的动荡与不安。奥马尔作为阿拉伯裔商人在桑给巴尔（Zanzibar）独立之后遭到本土激进民族主义政府迫害，被囚禁长达十一年之久，饱受摧残，家破人亡，他不得已逃亡至英国，却因为难民的身份而仍然难以结束漂泊无根的生活状态。拉蒂夫因为厌恶家族的丑闻与纠纷而远赴东德留学，却因为种族、肤色的问题而备受屈辱，无法在欧洲找到归属感：“我感受到了恶意，各种联想让我突然感到恐惧，同时又无可奈何。我想，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有一种语言从各个角落对着我吠叫和嘲笑。”（古尔纳, 2022, p. 83）学界的讨论相对忽略了小说中拉蒂夫与德国笔友扬（Jan）及其母亲艾莱克（Elleke）见面交谈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一情景蕴含了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古尔纳借助艾莱克之口，引用了古希腊传说中奥德修斯（Odysseus）返乡的典故，以反讽的方式揭示出小说中两位主人公无家可归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作家又借助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来指明，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往往重叠，在分裂、动荡、仇恨与冲突之后，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赢家：

艾莱克说：“战后，他们都被驱逐了。德国人在很多地方都遭到驱逐，苏台德，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等。几百万人。德累斯顿只剩下断垣残壁，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废墟上挣扎求生。正因为我们贪得无厌，破坏欲望强烈，造成到处荒芜、满目疮痍。”（古尔纳, 2022, p. 159）

在艾莱克的叙事中，迫害犹太人的德国人自身也沦为种族仇恨、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这与奥马尔和拉蒂夫两家的关系形成了微妙而隐蔽的对照：奥马尔由于被迫接收了拉蒂夫一家的房产而与对方结仇，成为“加害者”，而拉蒂夫的母亲作为“受害者”又借助其权贵情人致使奥马尔遭受牢狱之灾，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加害者”。在古尔纳笔下，国家层面的大历史与个体层面的小历史彼此交错，勾勒出共同体支离破碎的内在脉络。

总而言之，在古尔纳的小说世界中，“大屠杀”一词的内涵远远溢出其外延，成为一种象征，指涉更加广义上的共同体构建难题。那么，古尔纳对此问题的态度是否绝对悲观呢？接下来，本文将尝试说明，作家在小说中仍然传达了形塑平等、友爱、和谐的共同体的希望。

四、形塑共同体的希望

如果说,在古尔纳笔下,大屠杀隐喻书写具有象征意义,指涉共同体构建的困境或瓦解的危机,那么,形塑共同体的可能性就对此构成了一种批判的、积极的以及正面的回应,传达了作家的理想与希冀。正如评论家费莉希蒂·汉德(Felicity Hand)所言:“古尔纳的小说并非讲述严格意义上的成功故事,也不总是乐观的,但是的确传达了有关友谊与坚韧的积极信号……”(Hand, 2012, p. 57)在《天堂》《海边》与《来世》这三部小说中,古尔纳在沉重的基调之上,偶尔会增添几笔亮色,表达了形塑共同体的希望。

首先,《天堂》以主人公优素福对爱情与自由的不懈追寻来表达形塑共同体的希望。在阿齐兹叔叔的商贸帝国中,尽管人物之间偶尔会流露出彼此关照的情感,但更多表现为基于权力、利益的人身依附关系,充斥着猜忌、压迫与欺凌。面对阿齐兹叔叔的霸权,优素福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臣服与妥协,而是不断流露出独立自主的思想与行动。在聆听老园丁哈姆达尼(Mzee Hamdani)有关自由的理解后,优素福却没有完全接受老人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观念:“它无疑包含着智慧,却是一种隐忍和无能的智慧,从某种角度看也许令人钦佩,但当那些恶霸仍然骑在你头上拉屎拉尿时,却并非如此。”(古尔纳, 2022, p. 249)优素福认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父母身边、享受父母的恩荫与庇护,转而将对共同体的追寻转移到对阿明娜隐秘的爱情之上。尽管他对阿明娜的相思之情注定无法得到满足,却仍然能够感觉到对方与自己在心灵上的相通之处:“他对她的渴望中也有类似的东西,尽管一时想不起合适的话语来向她倾诉他的渴望,但他知道这并非一件微不足道、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情。”(古尔纳, 2022, p. 260)为此,他甚至不惜当面顶撞阿齐兹叔叔。在小说结尾,这种追寻共同体的渴望以优素福摆脱阿齐兹叔叔的掌控、投奔德国军队而告终。虽然这一尝试并非通往共同体的真正途径,而仅仅是短暂的解脱、无奈的选择,却仍然蕴含着一种不屈的希望。

其次,《来世》呈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共同体,都与小说的标题“来世”(afterlives)相呼应,在饱含动荡与沧桑的单一历史叙事的边缘,诉说着无数小人物、小历史的脉脉温情与乐观主义。首先,小说刻画了哈姆扎、阿菲娅、哈利法、阿莎等人相依为命的命运共同体。哈姆扎在挣脱奴仆身份、历经战火洗礼之后,凭借忠实与勤勉赢得了哈利法和阿莎夫妇的信任,与阿菲娅结为夫妻,开始了崭新的人生;阿菲娅在哈利法和阿莎(Asha)的关照之下,摆脱了叔叔一家的奴役与虐待,不仅收获了友谊,还与哈姆扎组建了温馨的家庭;哈利法夫妇虽然偶尔会存在分歧与争执,但是始终能够彼此关心、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古尔纳在道尽大历史洪流的波涛汹涌之余,又不失时机地描写出这个完全由小人物组成的微小共同体的难能可贵:

哈姆扎开始认为,哈利法是一个多愁善感、代人受过的罪人,一个为别人的苦难和他那个时代所干的坏事承担罪责的人;阿莎太太、伊利亚斯、阿菲娅,现在又是哈姆扎。他默默地关心和照顾这些人,同时又用直言不讳的鲁莽无礼和一贯的愤世嫉俗来掩饰这种冷不丁冒出来的关心。(古尔纳, 2022, p. 240)

其次，小说又描绘了哈姆扎与阿菲娅之子小伊利亚斯探询、记录舅舅伊利亚斯人生经历的记忆共同体。小伊利亚斯与素未谋面的舅舅同名，其名字本身就是对伊利亚斯的纪念。不仅如此，他在延续舅舅的梦想之余，又避免了舅舅的人生悲剧，远赴德国求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得到了德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在历史照片、文献档案、访谈录音和集中营幸存者回忆录的帮助下，小伊利亚斯得以拼贴、还原出舅舅的人生际遇，保留了有关家族历史的共同记忆。在小说结尾，小伊利亚斯讲述了舅舅以及儿子保罗（Paul）共同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往事，在黑暗的大历史背景之上，点缀了一笔小人物的亲情与人道主义精神：“所以，我们现在能确定无疑的是，伊利亚斯对父母说，有人深爱伊利亚斯舅舅，为了陪伴他，宁愿跟他去集中营赴死。”（古尔纳, 2022, p. 335）

最后，《海边》通过描述奥马尔与拉蒂夫这一对“世仇”的和解来展现形塑共同体的可能性。古尔纳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让两位主人公的叙事视角交错穿插，将彼此对事实真相的认知盲区补全，尤其借助两人直接发生的对话，通过坦诚的态度以及对往事详细真切的回忆来梳理清楚两家结仇的来龙去脉，从而消除误会、促成了仇恨的化解。小说在友好的氛围之中结束，预示着在度尽纷争与磨难的历史余波之后，共同体和谐友好的精神在逐渐复苏：拉蒂夫携女友拜访奥马尔，并且邀请他四处游玩，使得后者感觉自己好像是两人“年纪老迈的爸爸”（古尔纳, 2022, p. 284）；当拉蒂夫与女友在电话上相谈甚欢之时，在一旁的奥马尔也受到了这种融洽氛围的感染：“……在我的想象中，人们刚开始伟大友谊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古尔纳, 2022, p. 285）两位主人公的和解昭示了新的希望，肯定了重新开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寄托了古尔纳化解历史矛盾与纷争的理想主义。

由此可见，古尔纳描写众多小人物在小写历史中微不足道却难能可贵的温情、记忆与和解，以此映衬、反驳了以大屠杀为代表性事件的大写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构建共同体固然并非易事，其希望却也并不总是渺茫的，作家的态度并不完全悲观。

总之，在古尔纳笔下，大屠杀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最极端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更多表现为一种象征，表征共同体构建的困境乃至瓦解的危机。面对这一问题，作家没有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本土激进民族主义的话语桎梏，而是秉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以开放的心态与多元化的视角，在再现、揭露历史创伤之余，表达了形塑有机共同体的希望。在《海边》中，奥马尔回忆了自己在学校第一次看到老师讲解地图的场景：

……一个伟大的故事从此拉开了序幕。随着他的故事不断展开，他拿了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西北欧的海岸、伊比利亚半岛、南欧、沙姆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北非海岸，北非海岸凹凸曲折，向下溜到好望角。……蜿蜒向北，在鲁伍马三角洲稍微突出来一点点，然后凹进去，那里是我们的海湾，接着是非洲之角，再接着是红海海岸、苏伊士、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马来半岛，最后到达中国。他画到中国就停下来，笑容满面，他用粉笔画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勾勒了半个已知的世界。……（古尔纳, 2022, p. 43-44）

老师用粉笔勾勒出的是一个宏大广阔、辉煌璀璨的世界主义图景，在这里并不存在特定的中心，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是平等的。古尔纳似乎在借此暗示：被同情的不应当仅仅是遭受纳粹屠戮的犹太人，东非海岸的难民、移民乃至全世界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流散民众都应当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与尊重，正如汉德所言：“古尔纳笔下的移民不仅仅是籍籍无名的非洲人，其遭遇在小说之外注定不会得到讲述；相反，这些移民是我们每一个人。”（Hand, 2012, p. 40）古尔纳似乎在借助这一动人的场景来传达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理想，希冀着和谐友爱、平等公正的共同体能够真正到来。

五、结语

在难民潮、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波涛汹涌的当代国际社会，古尔纳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他在《天堂》、《来世》和《海边》等小说中书写东非海岸流散者的生存境遇，探讨西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东非社会造成的历史创伤，反思非洲本土激进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借助大屠杀隐喻来揭示人类共同体构建的普遍困境，呼吁对所有遭受压迫与苦难的生命给予同等的关注、尊重与同情。古尔纳没有沉湎于流散创伤与共同体瓦解造成的历史悲观主义，而是坚守人道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精神，在大写历史的残垣断壁之中挖掘小人物之间的脉脉温情，无论是《天堂》中优素福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与追寻，还是《来世》中哈姆扎一家相濡以沫的情谊与小伊利亚斯对家族记忆的传承，抑或《海边》中奥马尔与拉蒂夫恩怨情仇的和解，都寄托了作家形塑共同体的希冀，构成了对大屠杀隐喻的批判性回应，彰显弥合分裂、化解冲突并且追求平等与友爱的博大胸襟。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Y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5401-6278>

References

Gurnah, Abdulrazak (2002). *By the Sea*. Bloomsbury.

Gurnah, Abdulrazak (2004). *Paradise*. Bloomsbury.

Gurnah, Abdulrazak (2004). "Abdulrazak Gurnah with Susheila Nasta." In S. Nasta (Ed.), *Writing Across Worlds: Contemporary Writers Talk*. Routledge: 352-363.

Gurnah, Abdulrazak (2005). "Abdulrazak Gurnah in Conversation." *Wasafiri* (46): 37-42.

Gurnah, Abdulrazak (2021). *Afterlives*. Bloomsbury.

Hand, Felicity (2012). "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 Abdulrazak Gurnah." In J. P. A. Sell (Ed.), *Metaphor and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Writing*. Palgrave Macmillan: 39-58.

Tönnies, Ferdinand (2001).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Jose Harris, translated by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汉娜·阿伦特（2014）：《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rendt, Hannah (2014).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rans. Lin Xianghu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弗兰茨·法农（2005）：《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社。

[Fanon, Frantz (2005).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Wan Bing. Yilin Press.]

郭丹阳、王卓（2022）：“古尔纳《来世》的叙事策略与殖民身份困境”，《外国语文研究》（4）：21-29。

[Guo Danyang, Wang Zhuo (2022).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Colonial Identity Crisis in Abdulrazak Gurnah's *Afterlive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4): 21-29.]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2）：“从自发到自觉的写作——古尔纳获奖演说”，谢娟译。《世界文学》（2）：11-15。

[Gurnah, Abdulrazak (2022). "Writing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ness: Gurnah's Nobel Lecture," trans. Xie Juan. *World Literature* (2): 11-15.]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2）：《天堂》，刘国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Gurnah, Abdulrazak (2022). *Paradise*, trans. Liu Guozh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2）：《海边》，黄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Gurnah, Abdulrazak (2022). *By the Sea*, trans. Huang Xiea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2022）：《来世》，李和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Gurnah, Abdulrazak (2022). *Afterlives*, trans. Li Heq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J·希利斯·米勒（2019）：《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陈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Miller, J. Hillis (2019).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trans. Chen Xu.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张飞龙）